



火种

■郑茂琦

时近清明,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,有多少先烈为了让中华民族站起来,甘愿抛头颅,洒热血!在阅读作家江子的文章时,我仿佛走进了陵园,走进了历史:张子清把能救自己生命的盐无私地让给了战友,同时决心把自己化为盐,融化在中国的血管里,成为一切勇气、血性、力量的源泉。

在党的历史中,有很多这样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,它们就像一粒粒点燃信仰的燎原火种。长征雪途中,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被冻死,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,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,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,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。我们党就是靠着无数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,抱着融化自己的决心,才赢得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诗人说:“黑暗,在你冲锋时倒下;黎明,在你倒下时复苏;战士的血管里奔流出共和国诞生的音符!”

今天的风景,他们却未能看到。我真想捧一束鲜花,敬献给烈士的墓碑前,我想告诉他们——我们正实践着他们的希冀。

余叔插图:李 斌
版式设计:梁 晨

红 裤 子

■许建中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1940年7月,山东文登汤村。那是一个风雨夜,周三婶正在油灯下做针线活。三婶的儿子周润滋从屋外猛地推开门,身后紧跟着他的堂哥润津和大伯,几人搀扶着一位浑身是血的八路军进了屋。

“他婶,是我。”大伯压低嗓音说。

“三婶,俺排长伤得很重。”润津眼里闪着泪光。

“他婶,我那边人多,你这儿安全些。”

“不用说了。”三婶忙从板箱里拿出一床叠得整齐的蓝底白花粗布褥子,在炕上铺好,这才扶这位排长上炕躺下。

排长激动地说:“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“这是哪里话,你们豁上命打鬼子是为了谁?”

三婶给他翻过身子擦拭伤口,鲜血把褥子染红一大片,排长咬牙坚持着。这个排长叫赛时礼,他在夺敌人机枪时负了伤。一颗子弹击中左肩,从背后穿出。

周大伯竖起大拇指:“真是硬汉!他婶,我明天赶集把猪子卖了,抓些药,买些好东西给赛排长补身子,咱不能叫英雄倒在咱家里。”

周大伯转身对三婶娘俩说:“放心,滋儿娶亲的事先缓缓,我记着。”

三婶接上话:“我明白,他伯拿侄子比儿子还亲,津儿可比滋儿大呀。”

周润津笑了笑:“三婶,我是队伍上

的人,不打败鬼子我不娶媳妇!”

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,周大伯急急匆匆进门悄声说:“不好,鬼子可能要进村挨家挨户搜查,他们说有八路到咱们村来了。”说话间,外面传来零星枪声和嘈杂声。

周大伯对赛时礼说:“赛排长,你们快转移。我是村长,我在村里顶着。”说完,周大伯又去通知其他人了。

收拾好东西,赛时礼和周润津给三婶鞠躬道别,从后窗走了。三婶打开窗户,望见他们是往西去了,就转身出了屋门。不一会儿,三婶提着一只脖颈流血的鸡进来,包进染血的褥子里,然后用绳子捆起来,拉着儿子的手说:“滋儿,背上这床褥子向东跑。别害怕,有人问你为什么跑,就说怕被抓去当兵,准备出去找活干。一旦被褥子上有血,就说临走时俺妈给俺杀鸡吃,还没来得及炖,听到有动静,俺就用铺盖包着鸡跑出来了。”

润滋点点头,背起包袱就跑出门了。

“八路向东跑了。”东边响起追赶声和枪声。周三婶一个趔趄险些摔倒,又坚强地站立住……

多年后,赛时礼又回到汤村,那位三婶已经去世了,润滋成了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。周校长双手捧着一床红褥子,放在赛时礼跟前,泪光盈盈地指着褥子说:“俺妈当年叫我背着褥子跑,一来叫我引开鬼子,二来担心褥子留在家中被鬼子发现连累乡亲。说来也多亏这床褥子和褥子里面的鸡,挡住了鬼子的子弹,我的后背只伤了点皮。”赛时礼深情地说:“这上面的血,有我的,也有你老周兄弟的。”

盐

——为一位红军烈士代写的“自述”

■江 子

名家讲述

生活,远比小说神奇

我曾经是湖南桃江县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,一个在南方的水田里奔跑玩耍的男孩。

我有一个任过湖南江道区司令官的父亲,这也许是我与其他农村孩子不一样的地方。他是中国革命同盟会成员,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、护法战争。我承认我小时候对他所知甚少,甚至经常因无法记起他的长相而惆怅不已,因为我平时很难与他见上一面,即使见面也是匆匆分别,似乎有天大的事情在等着他。他总是显得神色疲惫行踪诡秘,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。他因病死于1917年,那时我才15岁,可他对我的影响有一生那么长。

我长大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从军这条路,来报效我的祖国。我曾经考入湖南讲武堂,毕业后参加了反军阀的斗争,却步步受挫。直到后来,我找到了我的组织,中国共产党。

那年我二十出头,考入了黄埔军校一期。没等毕业,我就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了一名学员,和毛泽东成为师生。我没有想到,我们将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。凭借引人注目军校双文凭和不错的军事才能,我连升军职。坦白地说,我对功名并不十分热衷。我出生于农村,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把农民当做革命的同盟军无比正确。中国的苦难太重,只有把最底层的无产者都动员起来,才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,我毅然加入到这个当时还很弱小的阵营,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1927年9月,我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。在这次战斗中,我当上了工农革命军第3团第1营营长。我们根据命令于9月11日在江西铜鼓操家伙开始动手,并迅速占领了浏阳的白沙镇、东门市,一度势如破竹。我打仗称得上是一把好手,指挥起来气定神闲,我的战士们也都非常勇敢,可是,国民党军队太过强大,我们失利了。

我们离开文家市向南退却。路上我们又一次次地遭到国民党兵的追杀,我的老团长、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芦溪牺牲,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。疲惫不堪的我们在白沙镇、东门市,一度势如破竹。我打仗称得上是一把好手,指挥起来气定神闲,我的战士们也都非常勇敢,可是,国民党军队太过强大,我们失利了。

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。若干年后,这里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圣地。

二

在井冈山,我们有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。为了开辟和扩大根据地,我们四处出击。10月的一个早晨,我们正在遂川大汾宿营,突然遭到了一股强大的武装袭击。我们对地形不熟、弹药不足,对方显然熟门熟路、火力很猛。我们的队伍被打成了首尾不顾的两截。我们后来知道了,那是当地大地主肖家璧的私人武装。

在匆忙中,我率领的部队与主力部队失散。我指挥战士们边打边退,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山乡野村转圈,完全辨不清方向。我们来到了一个县城,当地人告诉我们,这里是湖南桂东。在那里,我们有幸遇到藏身在滇军范石生军营里的南昌起义部队。朱德与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,他们关系要好,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才有了容身之所,我们也因此在桂东取得了合法的身份。就这样我们在桂东过了一个多月,传来了井冈山部队占领茶陵的消息,于是是率领队伍告别了桂东匆匆赶往茶陵。正遇湘军围困茶陵,我率部从外围杀人,这段时间的休整和训练让我们的战斗力倍增,围城敌军顿时溃退。

很快,我重新回到了井冈山。井冈山到处红旗猎猎,墙上写满了宣传工农革命军政策的标语。我对井冈山其实一无所知,可我就像游子回到了故乡那么亲切。

从1928年1月到3月,我和我的战士们日日枕戈待旦,我都不记得打过多少次仗。我经常在战壕里看着太阳升起,月亮缺又圆。我们身上的灰色军装经常脏兮兮湿漉漉的,有时候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。我的战士是好样的。井冈山寒冷异常,生活条件艰苦,他们依然是单衣单裤,吃红米饭、南瓜汤、干辣椒,睡稻草铺,兜里都只有几角钱,可是打起仗来,个个都是不要命的好汉。

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路上行军、打仗,随处都是阵地,随时都准备迎接新的战斗。我已经熟悉了井冈山茅草的气味、植被的气味,因为我们经常和它们为伴。我的耳朵天天响彻着冲锋号声,枪栓拉动的声音,子弹的嗖嗖之声,以及手榴弹的爆炸声。我们始终在井冈山的前沿部队,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尖刀和屏障。为了接应朱德、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,1928年4月我去了湘南。这次,我们遇到了对手——湘军集3个团的兵力抢占湖南酃县,企图卡住朱德部队上山的咽喉。两军交战勇者胜,我指挥全团沉着应战,先后打退过敌人的十多次冲锋。有一个叫湘山寺的地方属于战略高地,我们相互争夺,拉锯般地得而复失、失而复得。最后我采取了正面吸引、迂回突袭的战术,总算消灭了湘山寺的守敌,完全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。战斗,因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
然而,有两颗机枪子弹打中了我左脚。我顿时痛得晕死过去了。

三

朱德、陈毅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。正是初夏,井冈山万物葱茏,植被丰茂。会师后的井冈山有与这个季节相得益彰的生机勃勃。可我不幸成了一名伤员。

昔日的我生龙活虎,可在两军的会师大会上,我被迫躺在担架上被战士抬着进了会场。所有的人为我欢呼,因为我是为两军会师出生入死的勇士,其中声音最大的肯定是我的战友。我在担架上欠了欠身向他们挥手致意,可是我的脚仿佛让我痛得咧开了嘴。

红四军成立后,我担任了第11师师长兼第31团团团长。在稍后召开的湘赣边界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,我又被选为特委委员。可是这些职务对我不过是一种名誉。我无法履行我的职责,我几乎所有时间都躺在医院里,工作都是由别人代干。

我住进了红军医院。我以为自己的枪伤并不严重,伤在脚踝部位,并不是要害。我要医生把子弹取出来。我想取出子弹之后再养一阵就可以重返战场。当时医院条件非常简陋,不要说没有消毒的西药,就连做手术的麻药也没有。可为了能上前线,我要医生在没有任何麻药的情况下切开我的脚板。可是医生切开我的脚板后,用竹片制成的粗糙无比的镊子找了半天,也没有找到那两颗弹头。

我的血流了一地。让我不满意的是,它们不是鲜红的,而是呈黑紫色,并且有难闻的腥臭味。我的肌体正在发生可怕的变化。

我以为命运只是取消我行走的权利。我想我顶多会成为一名残废,可是我料不到那反反复复的伤口已经住进了死神。

我的脸越来越瘦,越来越苍白,而我的腿肿得越来越粗,颜色在加深,仿佛是一件铜铸的雕塑那样金光闪闪。最后,甚至肿到了小腹。我的身子变得无比难看。那条肿胀的腿,是任何宽大的裤管都容不下的,我索性剪开裤子,让腿腿裸在外面。那是该打着绑腿走在行军路上强健有力的腿,可是现在,它只能待在病房里。

与伤病作战是一场更为残酷的战斗。

四

我终于要说到盐了。

在井冈山,盐这种寻常人家五味盒



里再普通不过的东西,成了无比珍贵的晶体。国民党在通往井冈山的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,他们叫嚣,即使把一粒盐绑在鸟腿上,他们都要把它打落在封锁区以外。即使是秋天的霜、冬天的雪,他们都要尝尝是不是咸的。他们妄图用对盐和药品进行封锁的方式,把红军困死在井冈山。

部队有不少战士因为很久吃不到盐已经全身浮肿,行动乏力。我听说,在行军途中,有的战士倒下去,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而更多的战士,他们行军湿透军衣的汗水里,也没有一点咸味儿了。盐也是在没有消炎药的情况下杀菌防感染、清洗伤口的替代药品。我亲眼看到,有很多伤员,他们的枪伤因为没有盐的清洗,已经开始大面积溃烂了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我们在井冈山进行的革命,其实就是一场与国民党军队的盐的战争。

为了打赢这场战争,井冈山军民个个都成了捍卫盐的战士。大家一起动手用陈年老窖的泥土熬制硝盐,代替食用的盐。这种方法熬出来的硝盐味道不太好,很苦,但总算可解一时之急了。也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,想方设法从国民党控制区偷偷向根据地运送食盐。他们把盐藏在竹筒内、货郎担里、篮子底下、双层底的水桶底内等,但最后都被国民党兵发现了。有一个叫聂槐妆的井冈山妇女,办法更为绝妙。她把食盐溶化在锅里,把棉衣浸泡其中,待棉衣把盐水全部吸入,然后烘干穿在身上,外面罩上一件外衣,趁天黑后通过封锁线,爬山过坳找到红军驻地,脱下棉衣用水稀释,烧干,一次可以得到不少盐呢。可是最终,她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,引起了国民党士兵的怀疑而被捕,牺牲时年仅21岁。

我这个医院里的老病号,也有机会加入到这个战斗中来了。

第31团的战士们前来看望他们的老团长。他们给我带来了一小包盐作为礼物。我本来再三谢绝,这么珍贵的东西应该献给在前线杀敌的战士,或者医院里其他的伤病员,而不应该给我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废人。可感情难却,最后我还是留下了这一小包盐。

我的舌尖,多么想尝尝这久违了的让人馋涎欲滴的咸味呀。

我的伤口,多么想享受一次痛快淋漓的清洗呀。

可是我没有用它。在我眼里,那已经不是盐,那是一箱足可以让整个部队提高一倍战斗力的重型武器。

不久,这包盐派上了用场。医院里已经断了盐,有一个星期没有给伤员用盐水洗伤口,野地里采的金银花熬的水并没有什么作用。我把这一小包盐从枕头下拿出来,我希望医院里所有的轻重伤员都能痊愈,到前线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奋勇杀敌。

我的脚肿得越来越厉害。虽然我在医院里经常和伤员们一起大声说笑和唱歌,事实上,我经常发着高烧,痛得彻夜不眠。为免得影响大家的休息,我咬紧牙关,绝对不喊出声来。

可我又一次得到了提拔。1929年初,湘赣两省调集重兵进攻井冈山,红四军决定将主力引向赣南,红五军留守井冈山。而我,一个只适合躺在担架上的伤员,一个很长时间只与自己的枪伤作战的战士,被留下来担任红五军的参谋长,与红五军一起守山,用我的所学,制定作战方案。

但不久,井冈山失守了。红五军突围出山,我被当地百姓护送到深山的石洞里。

我躲在荒无人烟的山洞里。除了一点干豆和竹笋,没有粮食。我衣衫单薄。我又冷又饿。

我经常在洞口看着雪漫天飞舞。我会大声问:有人吗?可是只有风在呼啸,只有雪扑扑地从树上落。

望着满山的雪,我会出现幻觉。这是上天撒下的来拯救我们队伍的盐吗?有了这些盐,我们800多名伤病员如决堤的伤口就可以堵住合拢,我们的士兵就可以非常强健地去冲锋战斗了。我也可以得救,重新威武地站在我的士兵面前。

我在进行我一个人的战争。我是我的战友,我也是我的敌人。我的身体里有两个我,一个是被寒冷、饥饿、伤病、孤独纠缠不休的我,一个是在枪林弹雨中无所畏惧的充满了求生愿望的不屈的我。

许多天后,当地方上的同志把我找到时,我骨瘦如柴,胡须拉碴,神志不清,差不多奄奄一息了。

可我知道,我赢了。

五

山洞里的折磨彻底摧垮了我的身体。我看到我身体的战壕里一片狼藉,我生命的城池随时会被攻陷。每到夜里,我就仿佛听见我的伤口响彻神神的嚎叫。我经常被烧得神志不清。

我被转移到永新县一座叫蕉林寺的寺庙里。我看着寺庙里的佛像,他们端坐在自己的莲花宝座上,佛像前有供人朝拜的蒲团。而我心中也有一个祭坛,那是我信仰的关乎民族和民生的主义。而我,要和无数的死难者一起,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这个祭坛。

我的眼前经常一阵模糊。有时候,我似乎看到了我的父亲。他一身戎装,威风凛凛。与我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,我也有赫赫战功,我不知道我今天的样子是否让他满意。

我把自己使用多年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交给了守在一旁的战友——这意味着我已经准备好向命运缴械。我曾经希望枪管里的吼叫唤醒更多中国人的血性,而现在,我希望我的枪,依然能发出我的吼叫,依然葆有我生前的血性。

六

我叫张子清,小时候叫过一段时间张涛。我生于1902年,属虎,死于1930年5月。

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守门人。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部苦难、悲壮与抗争的一个象征。

不,我其实就是一粒盐,一粒普通的盐,一粒经过战火冶炼的盐,要消失在时间的河里。

一粒穿灰色军装的盐,要融化在中国革命的血管里,成为摧毁黑暗、腐朽世界的一切勇气、血性的源泉,成为让旧中国的巨大创口迅速愈合的良药。

我很早就知道,只有无数的盐融化于中国的血管,才能把那颗躁动了五千年的衰老不堪的心脏重新激活,才能让全身乏力、两腿虚弱的中国站直了身躯。

为了让中国站立,我抱着融化之决心。我死而无憾。



江子 本名曾清生,江西吉水人。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,出版有长篇散文《青花帝国》、散文集《去林芝看桃花》《苍山如海——井冈山往事》等。

